

北欧， 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

[英] 迈克尔·布斯 (Michael Booth) 著

梁卿译



The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

The Truth About The Nordic Miracl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有关此电子书的说明

本人可以帮助你找到你要的PDF电子书，计算机类，文学，艺术，设计，医学，理学，经济，金融等等。质量都很清晰，为方便读者阅读观看，每本100%都带可跳转的书签索引和目录，只要您提供给我书的相关信息，一般我都能找到，如果您有需求，请联系我 QQ1779903665。

PDF代找说明：

本人已经帮助了上万人找到了他们需要的PDF，其实网上有很多PDF,大家如果在网上不到的话，可以联系我QQ，大部分我都可以找到，而且每本100%带书签索引目录。因PDF电子书都有版权，请不要随意传播，如果您有经济购买能力，请尽量购买正版。

提供各种书籍的pd电子版代找服务，如果你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书的pdf电子版，我们可以帮您找到，如有需要，请联系 QQ 1779903665.

备用:QQ 461573687

声明：本人只提供代找服务，每本100%索引书签和目录，因寻找和后期制作pdf电子书有一定难度，仅收取代找费用。如因PDF产生的版权纠纷，与本人无关，我们仅仅只是帮助你寻找到你要的pdf而已。

北欧， 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

[英] 迈克尔·布斯 (Michael Booth) 著

梁 卿 译

N o r d i c

The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

The Truth About The Nordic Miracle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書店 出版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16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The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 The Truth About The Nordic Miracle

Copyright © 2014 by Michael Booth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Greene & Heaton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欧，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 / [英] 布斯著；梁卿译

— 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6.1

ISBN 978-7-80768-101-4

I. ① N… II. ①布… ②梁… III. ①北欧 - 概况

IV. ① K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8775 号

策划编辑 苏 毅

责任编辑 苏 毅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宇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图 字 01-2014-6901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6

印 数 0,001-8,000 册

字 数 328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7；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献给莉森、阿斯格和埃米尔

引言

若干年前，我住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四月一个昏黑的清晨，我裹着毛毯坐在起居室，满心盼望着春天赶快来临。随手翻开当天的报纸，我惊讶地看到，根据莱斯特大学心理学系提出的生活满意度指数，丹麦，我的这个第二祖国的国民被评选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报纸的日期：这天并不是愚人节。我立刻上网查看，发现这条新闻正作为头条，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从《每日邮报》到半岛电视台，所有媒体都在报道这条新闻，就好像它是刻在石匾上庄严地传承下来的。丹麦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度。最幸福？就是这个地势平坦、阴暗潮湿、单调沉闷的小国家吗？如今我在这里成家立业，它只有为数不多的坚韧明理的人口，却有着全世界最高的税率。英国在这张榜单上排名第 41 位。既然这是大学里的学者评选出来的结果，想必有它的道理。

“唔，这里的人把自己的幸福感隐藏得太深了，”我这样想着，抬头向窗外望去，整个海港浸没在淅淅沥沥的雨水中，“我并不觉得他们有多欢快。”丹麦作为自行车王国久负盛名。窗外不远处，骑自行车的人和打着伞的行人相互挨挤，一起经过长桥（Langebrogade），他们都得小

心地闪避过往的卡车和公共汽车溅起的水花。

我不由地想起前一天令人心灰意冷的历险。我初来乍到这个第二故乡，每周两次到本地的超市购物。上午，我不得不和超市收银员打交道，那是个脸色沉郁的年轻姑娘，她自顾自地用收银机记账，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超市里买到的农产品品质不高，价格却贵得离谱。出了超市，我闯红灯过了马路，耳边清清楚楚地听到其他行人向我发出嘘声。其实路上并没有车。可是在丹麦，不等绿灯亮起就过马路，是对社交礼仪明目张胆的挑衅。我在蒙蒙细雨中骑着自行车回到家，一进门就看到一张催缴税单，它把我当月的收入不由分说砍掉一大块；回来的路上我还惹恼了一个开车的人，他恐吓说要把我的命夺去，因为我违反了禁止左转的规定（真的，他摇下车窗玻璃，对我大喊大叫：‘你不要命了！’那副神气和腔调，活脱脱就是邦德片中的坏蛋）。晚上，黄金时段的电视娱乐，先是一档农业节目，探讨怎么避免过度摩擦奶牛的乳房，接着是一部已经播出了10年的电视剧《塔格特》（*Taggart*），再接下来是一档有奖竞赛节目《谁想当百万富翁》——这个名称乍听起来让人血脉贲张，因为一朝中奖，人生便可从此改变，只可惜有一个事实大煞风景：100万克朗的价值只合约10万英镑，在丹麦，这笔钱只够外出吃一顿饭，剩下的零头可以看一场电影。

我得补充说明一点，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彼时，那几部被批评界广泛赞誉的丹麦电视连续剧尚未播出，新式的北欧烹饪尚未在我们的厨房发起革命，电视剧中的女侦探莎拉·路德尚未用她那款式别致的毛衣使我们着迷，剧中的丹麦首位女首相比吉特·尼堡也尚未凭借她的铅笔裙和她对右翼政客们干脆利落的态度让我们神魂颠倒，近年来貌似绵绵不绝的丹麦热潮也尚未风靡全世界。早在那个时候，我就发觉，丹麦人本性纯良，工作勤勉，遵纪守法，根本不喜欢公开表露情感，更何况炫耀自己的幸福感。丹麦人天生是路德宗的信徒，哪怕他们并不举行路

德宗的仪式：他们不喜张扬，他们对肆意外露的情感心存怀疑，他们个个自成一体。比如与泰国人、波多黎各人乃至英国人相比，丹麦人显得态度冷淡，神情严峻。我甚至要说，在我当年游历过的 50 多个国家的国民当中，丹麦人与瑞典人、芬兰人以及挪威人一道，也许是表面看来最不快乐的人，在全世界排在垫底的位置。

我心里想，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普遍服用抗抑郁药，导致感知力下降的缘故。我读过一篇新近出炉的报告，该报告称，在欧洲，只有冰岛人比丹麦人服用的抗抑郁药还要多，而且，人们吞服抗抑郁药的频率在加快。丹麦人的幸福感难道只是在百忧解药效作用下的懵懵懂懂吗？

事实上，当我开始深刻挖掘丹麦人的幸福现象之后，我发现，莱斯特大学的报告并不像它自认为的那么具有突破性。早在 1973 年，欧盟首次发起主观境况认知调查——“欧洲晴雨表”，丹麦人就名列榜首，今天依然如此。在最近一次调查中，数千名丹麦人接受了调查，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声称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2009 年，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宛若教皇莅临一般访问了哥本哈根。她举例说明，“人们把孩子留在咖啡馆外面的婴儿车里，却不必担心孩子会被偷走……人们没有争分夺秒、争先恐后地想要获取再获取”，她指出，这就是丹麦人生活成功的秘诀。既然奥普拉也对丹麦人赞赏有加，必然有她的道理。

其实，奥普拉大驾光临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丹麦。我没完没了地向妻子抱怨她的祖国，把她逼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气候恶劣难熬；税负之重令人发指；文化单一，全无新奇之处；社会氛围沉闷，公众执意主张以最低的共同标准达成共识；人们害怕超乎常规的事物和特立独行的人，对雄心抱负不以为然，不赞成追求成功；公共服务部门的态度坏得令人惊骇；居民毫无顾忌地食用肥腻的猪肉、咸甘草、廉价啤酒和杏仁糖等等。但我还是继续警觉地，并且不无困惑地关注着丹麦人的幸

福现象。

比如，看到下面的调查结果，我摇头不信。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请155个国家的1000名15岁以上受访者，按照从1到10的得分，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和未来期待的生活给出评价，丹麦高居榜首。盖洛普还提了其他一些关于社会支持（“如果遇到麻烦，你有没有随时可以寻求帮助的亲戚朋友？”）、自由（“在你的所在国，你能否自主作出生活选择，你对这种自由度是否满意？”）、腐败（“在你的所在国，商业界是否普遍存在腐败？”）等问题。答卷表明，82%的丹麦人给出了“生活美满”的回答，只有1%给出了“生活困苦”的回答。“每日体验”一项满分10分，他们给出的平均分是7.9，为全世界最高。与之相比，非洲的多哥是得分最低的国家，只有1%的人给出了“生活美满”的回答。

“也许他们应该问问住在哥本哈根西南伊斯霍伊（Ishøj）的索马里移民过得幸福不幸福。”我每次听到此类调查报告，心里就会冒出这个念头。我发自内心地怀疑，那些研究人员至多只去了欣欣向荣的哥本哈根郊区，根本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

而今，丹麦人的幸福故事到了最后的高潮：2012年，联合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新鲜出炉，它由经济学家约翰·赫利韦尔、理查德·莱亚德和杰弗里·萨克斯共同编撰，他们把已有的“幸福”研究成果——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World and European Values Surveys）、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等等作了个大汇总。你猜结果怎么样？排在第一名的是比利时！好吧，我是开玩笑的。丹麦再一次被评选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芬兰（第二名）、挪威（第三名）和瑞典（第七名）。

正如王尔德《不可儿戏》中的布莱克奈尔女士所说，“失去父亲或母亲可以认为是不幸，失去双亲，就可能是粗心大意了。”赢得一次幸

福调查也许是运气好，但是，自1973年以来，次次在此类调查中独占鳌头，这就让人完全有理由写出一篇权威性的人类学论文了。

不过，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丹麦并非没有竞争对手。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北欧各国均能够提出本国的生活质量最高的理由。联合国的这份报告发表后不久，《新闻周刊》宣布，芬兰才是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而不是丹麦；根据联合国自己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最高的则是挪威。还有一份近期发表的报告称，如果身为女性，瑞典是最宜居的国家。

所以，在此类名目繁多的主观境况认知调查、满意度调查和幸福调查中，虽然丹麦不一定每次都当仁不让地稳居第一，却每次都相差无几；即使它不是第一，也必然是另一个北欧国家居于第一。新西兰或者日本偶尔会挤上榜单（也许还有新加坡或者瑞士），但是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报告传递出来的信息十分明晰，像一杯加了冰块的杜松子酒那般清澈透明，那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不仅是全世界最幸福、最满足的人，他们也是最和睦、包容、主张平等、追求进步的人，他们富足、现代、开明，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思想解放，技术领先，他们欣赏最美妙的流行乐、最精彩的电视侦探片，甚至近几年来，他们还有最美味的餐厅可供享用。欧洲和美国的媒体对这一信息深信不疑，并热情洋溢地把它到处传扬。北欧这五个国家当中——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和冰岛——有全世界最完善的教育系统（芬兰），有适度世俗、文化多元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典范（瑞典）；有利用巨大的石油财富进行明智而合乎道德的长远投资，而不是执迷于建造愚蠢的高楼大厦或者发展红灯区和性产业的社会（挪威）；有全世界两性最平等、男性寿命最长且大量出产鳕鱼的国家（冰岛）；还有有着雄心勃勃的环境政策和充裕资金的福利国家（所有五个国家）。

人们似乎达成了不容辩驳的共识：为了过上圆满、幸福、平衡、

健康而明智的生活，如果你想寻找一个确定的榜样，就应该把目光投向德国以北、俄罗斯以西的那块地方。

我岂止是把目光投向那里。我先是远远地关注着丹麦人的幸福现象，眼看着它作为一股风潮势不可挡地席卷全世界，这样关注了几年之后，我又把家搬回到那里——其间定期回去，我看到的情况只是加深了我的困惑（天气还是那么恶劣吗？看情况。税率还是 50% 以上吗？没错。你每次要买东西，商店都在打烊吗？噢，是的）。

我搬回丹麦生活，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既往不咎的胸襟，也不是要发起宏伟的实验，测试人类的忍受力能够达到怎样的极限，而是因为我的妻子想要回到她的祖国，虽然我浑身上下的每个细胞都在大声呼喊：“迈克尔，你难道忘了当年在那里生活时是什么光景吗？”但是，多年共同生活的惨痛经验告诉我，通常情况下，长远看来，我最好还是照她说的去做。

在我搬回丹麦生活以后，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北欧热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更加如火如荼。整个世界好像对当代北欧文化拥有不知餍足的胃口：瑞典的犯罪小说作家亨宁·曼凯尔和斯蒂格·拉森的图书售出了数百万册；丹麦的全国性广播电台——丹麦广播电台卖掉了 3 个系列的犯罪惊悚题材电视剧《谋杀》（Forbrydelsen），卖给 120 个国家，美国甚至翻拍了电视连续剧。该公司后续推出了政治剧《权利的堡垒》（Borgen，直译为城堡，是人们对丹麦国会大厦的昵称），该剧赢得了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BBC 4 频道靠它吸引了上百万的观众；就连丹麦—瑞典合拍的犯罪题材连续剧《桥》（Broen）也热播一时。（其实，除了故事背景，《谋杀》没有多少原创性可言——我们在电视里已经看到过不少作风强悍的女警察了；《权利的堡垒》只是一部三流的《白宫风云》，只不过使用的道具更精致一些罢了；《桥》则是彻头彻尾的垃圾。）丹麦的建筑师群体，其中最当红

的莫过于比雅克·英格斯（Bjarke Ingels），突然之间开始接二连三地担纲重要的国际建筑项目，交出类似乐高玩具组合而成的作品。从路易威登的橱窗陈设，到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则随处可见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等丹麦艺术家的作品。丹麦前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出任了北约新任秘书长，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丹麦电影荣耀一时，赢得了奥斯卡和戛纳电影节的众多奖项，托马斯·温特伯格、拉斯·冯·提尔、苏珊娜·比尔和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等成了今日影坛享有盛誉的一代知名导演，演员麦斯·米科尔森（出演《007：大战皇家赌场》《狩猎》和《汉尼拔》）在丹麦和国际荧屏上成了如此熟悉的面孔，让人不由得想起约翰·厄普代克说过的那句著名的对句，虽然他指的是另外一名红遍天下的法国演员：“我想我不会看到哪部法国电影里没有德帕迪约的面孔。”当然了，还有新式北欧菜肴的“革命”，哥本哈根的诺玛（Noma）餐厅走过了从籍籍无名的小店到引领国际潮流的历程，连续三次被评为全球最佳餐厅，她的厨师勒内·雷哲皮也一举成名，成了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明星厨师。

再说说丹麦以外的其他北欧国家。芬兰为我们奉献了“愤怒的小鸟”；摇滚乐队洛尔迪（Lordi）身着半兽人的装束赢得了欧洲歌唱大赛的冠军；手机如今已经成了人们装在胸前口袋、须臾无法离身的必备品。与此同时，瑞典的H&M时装和宜家家居仍旧岿然不动地雄踞商业街，而这里无法一一罗列的瑞典流行音乐出品人和歌手也继续称霸国际乐坛，此外，瑞典还给了我们Skype和Spotify。挪威依旧在为全世界供应石油和炸鱼条。冰岛则发起了富有冒险精神的金融狂欢。

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查看新闻，总是不可避免地看到对斯堪的纳维亚（除了冰岛）异口同声的夸赞。如果我们对报纸、电视和广播里的报道信以为真，那么，北欧国家几乎从来不会做错事。北欧是平等、宜居

的应许之地，那里的人们生活质量很高，热衷家庭烘焙。不过，我亲身在这块寒冷、阴沉的地区生活过，我看到了它的另一面，虽然斯堪的纳维亚生活的许多方面的确堪为表率，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向它们学习的地方很多，但是，人们把我的第二祖国描绘成一个如此整齐划一、缺乏层次的地方，却着实让我恼火。

这种对斯堪的纳维亚一切事物的全新迷恋——不管是自由形态的学校、刷得雪白的室内设计、谋求共识的政治制度，还是厚实暖和的针织套衫——有一点尤其让我觉得奇怪：既然关于北欧全都是正面宣传，既然明知道所谓的北欧奇迹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为什么人们没有蜂拥而至，到这里生活？为什么人们还是梦想在西班牙或者法国拥有一处住房？为什么他们不打起行装，向奥尔堡（Aalborg）或者特隆赫姆（Trondheim）进发？虽然看了那么多犯罪小说和电视剧，为什么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仍然知之甚少？为什么你完全不知道奥尔堡和特隆赫姆到底在什么地方（实话实说，不要撒谎）？为什么你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讲瑞典语，没有人“勉强会说”挪威语？请你说出丹麦外交大臣的名字，或者挪威最火的喜剧演员的名字。抑或一个芬兰人的名字，随便一个芬兰人。你一定觉得为难吧。

很少有人去过日本或者俄罗斯，也很少有人会讲日语或者俄语，但是，虽然你也许说不出这两个国家每一位政治领袖和艺术家的姓名，也不知道它们所有的二级城市的名称，我想，你至少能够说出几个人的名字或者几座城市的名称。斯堪的纳维亚则不然，它是一块真正的未知领地。罗马人懒得理会它。查理曼大帝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北欧历史学家德里在论及这一地区的历史时写道，数千年来，“北方几乎完全处在文明人感兴趣的范围以外”。即使今天，这种缺乏兴趣也是相当普遍的。英国专栏作家吉尔（A. A. Gill）不久前还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撰文描写地球的这个角落，“那里的几个国家，我们分不清哪个

是哪个”。

这个地区对人们来说普遍是个盲区——我首先要承认，在我搬到这里生活以前，我对这一地区一无所知——部分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到地球的这个角落来旅游。虽然这里有惊人美丽的风光，可是，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费用，再加上它恶劣的气候（更别提法国始终在那里，它把一大部分游客拉走了），很容易让多数人打消前来这里度假的念头。你看到过关于北方五国的游记吗？英国连锁书店沃特斯通的书架上，塞满了琳琅满目的地中海回忆录，把书架都压弯了——《橄榄林间的嗜酒狂人》、《橘子树上的婚外情》等等——可是，好像没有人愿意去芬兰的图尔库（Turku）小住，或者驾车游历瑞典、芬兰，写上一两本《图尔库的一年》、《车过越橘林》之类的书。

一天，我在本地的药店站了半个小时，等待接受服务（丹麦的药店是垄断经营的，所以客户服务不是他们重视的问题），百无聊赖之中，我突然想到，虽然《卫报》上刊登了丹麦女演员苏菲·格拉宝（《谋杀》中的明星）那么多光彩照人的剧照，虽然人们连篇累牍地写文章介绍法罗群岛的针织品，介绍用精心采集的草叶制作菜肴的20种食谱（这里我要举手声明，我自己就写过好几篇此类文章），事实却是，我们从学校老师、电视和报纸上获取的有关生活在蛮荒的亚马孙河流域的部落的知识，远远超过了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人及其真实生活的了解。

这一点很奇怪，因为丹麦人和挪威人是我们东边的近邻，冰岛人是我们北边的近邻，就国民性格而言，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共通之处超过了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我们幽默、宽容、诚实，我们不相信宗教训诫和政治权威，我们在恶劣的天气面前泰然自若，我们的社会井然有序，我们厨艺糟糕，对服装裁剪不那么孜孜以求，等等。（这些特点与我们的南方邻国迥然相异，它们的国民性格是：情感外溢，腐败猖獗，幽默感

流于浅白，情绪多变如同青春期的少年，个人卫生不拘小节，菜肴精美可口，着装雅致得体。)

你甚至还可以争辩说，我们英国人本质上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嗯，有点儿像。不可否认，英国与北欧的文化渊源是深刻而持久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793年1月8日，这一天，维京人首次无耻地洗劫了林迪斯法恩修道院。当时的记录是这样写的，“野蛮人肆无忌惮的侵袭，给圣岛林迪斯法恩的神的教会造成了令人惋惜的浩劫”。

维京国王们后来统治了英国三分之一的国土——那块土地因此叫作丹麦区(Danelaw)——在其鼎盛时期，那位伟大的识破谰词的克努特国王，成了全英格兰当仁不让的君主。在萨顿胡挖掘出一艘葬船，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英国与瑞典存在渊源的大量证据。有大量证据表明，维京各部落摒弃了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行为之后，他们定居下来，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睦相处，彼此通婚，对本地人口产生了重要影响。

毫无疑问，他们在英语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语言学教授詹·特里·法兰德不久前竟然宣称，英语是一门斯堪的纳维亚语。他指出，二者有很多共同的词汇，还有类似的动词后加宾语的语序(不同于德语的语法)，等等。把约克郡分成北区、东区和西区三个“区”(riding)，就是源自维京人对“第三”(third)的说法；我猜想约克郡的“山谷”(dales)也是从北欧来的(*dal*是丹麦语“山谷”的意思)；我还经常怀疑，英格兰北部口音的喉塞音会不会是受到了丹麦语的影响(丹麦人说话时，经常听起来好像不但把每个单词里不太重要的辅音吞下去，还要把自己的舌头吞下去)。此外还有几个表示工作日的词(*Wondin*或者*Odin*是星期三[Wednesday]；*Thor*是星期四[Thursday]；*Freya*是星期五[Friday])，以及许多地名。《末

日审判书》¹里，斯堪的纳维亚人用来表示定居点的名称随处可见：凡是以“-by”或者“-thorpe”结尾的城镇（意思是“城镇”或者“较小的定居点”），以前都曾经是维京人的聚居区，如 Derby、Whitby、Scunthorpe、Cleethorpes 等等。我的出生地附近有个城镇叫东格林斯特德（East Grinstead），我认为，这个名称是从丹麦语来的（*sted* 的意思是“地方”，在丹麦语中，这是个城镇名常用的词尾）。我以前在伦敦时的住处离丹麦山（Denmark Hill）只有 5 分钟的距离。众所周知，丹麦山这个名称得自年代较近的纽带：此地曾经是安妮女王的丹麦配偶的家，几百年来，丹麦和英国皇室以通婚的方式紧密交融。

家庭成员的名称——母亲（*mother* [*mor*]）、父亲（*father* [*far*]）、姐妹（*sister* [*søster*]）和兄弟（*brother* [*bror*]）也都非常相似。我认为非常可惜的是，英语终究没有采用斯堪的纳维亚语中非常实用的 *far-far*、*mor-mor*、*far-mor*、*mor-far*，把父亲和母亲一方各自的长辈加以区别。

“时至今日，约克郡的农民还可以与挪威农民聊养羊的话题，彼此都能听懂对方说话。”伊丽莎白·阿什曼·罗博士是剑桥大学的斯堪的纳维亚历史讲师，我向她问起维京人给英国留下了哪些遗产时，她这样对我说。我听到过类似的说法，说的是诺福克（Norfolk）的渔民和日德兰西海岸的渔民大体上能够对话交流。罗还指出其他一些文化纽带：从托尔金到 J. K. 罗琳等作家都受到了北欧文化的影响，北欧文化也影响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时代运动和重金属音乐的发展。

当然，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也蔓延到了西边更远的地方。挪威的维京人雷夫·埃里克森（Leif Ericson）在公元 1000 年左右发现了美洲。可是，他认为纽芬兰没有什么吸引力，于是马上掉转船头打道回府。不

[1]（*Domesday Book*）其正式名称应是《土地赋税调查书》或《温彻斯特书》，又称“最终税册”，是由英王威廉一世于 1086 年下令进行的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编。——译者注

过，后来持续了 900 多年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向北美大陆移民的努力较为成功，有 1 200 万瑞典人、大量挪威人和一部分芬兰人，乘船横渡大西洋，前往北美。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一度占到了抵达美国的移民的十分之一，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去了明尼苏达，因为那里的自然风光让他们想起故土家园。今天，据说美国有近 500 万挪威裔美国人和同样数量的瑞典裔美国人。如果没有早年的移民，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的好莱坞女星乌玛·瑟曼和斯嘉丽·约翰逊了。

当前的北欧热之所以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是因为在 20 世纪，流行文化的影响基本上与现在的传播方向相反。举例说明，与斯堪的纳维亚某个年龄段的男性交往，到了某个时刻，话题几乎一定会转向英国六人喜剧团体蒙提·派森的小品。而女性则会热泪盈眶地回忆起英国电视连续剧《故园风雨后》中的男演员，或者说起她们在伦敦做互惠生时的情形。所有人都对英剧《楼上，楼下》、特雷沃·伊芙和《恶搞整九新闻》耳熟能详，并且坚决认为，《摆谱》（Keeping Up Appearances）是英国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斯堪的纳维亚人享有高度先进的教育系统，他们却迷恋《杀机四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只要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一间长满常春藤的科茨沃尔德风格的木屋里新发现了一具死尸，他们就称心满意，好似上了天堂。就连英国内阁成员的更换也会登上丹麦的新闻。我想知道的是，有几位英国的内阁成员能说出他们的丹麦同仁的姓名？

也许这种朦胧的相似性，这种浅表的共同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缺乏兴趣，不肯透过表象，去了解他们真正的内涵。还有，虽然脸谱化的描述通常总会提到他们的性自由和健美体格，可是，他们仍然呈现为虔诚的、道貌岸然的路德宗信徒的形象。给人留下外表冷漠、内心狂热的印象，实在是高明的做法，不是吗？再说，斯堪的纳维亚人从不喜欢自我表白，因此，也无从修正我们的印

象：他们不喜欢吹牛。吹牛违背他们的规矩（我们会发现，这一点千真万确）。翻开字典查一查“reticent”（寡言少语）这个词，里面不会画着一个腼腆的芬兰人站在角落里，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作为图例，但是在现实中，这却是芬兰人的典型形象。

我在写这本书期间，有几个北欧人（有丹麦人，也有瑞典人），尤其是许多瑞典人——对我的选题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困惑：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居然还会有人对他们感兴趣？“你为什么认为人们想要了解我们呢？”他们问道，“有什么好知道的呢？”“我们都很乏味，很呆板。”“世界上一定有更有意思的人可写。你何不去南欧看看？”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自己的看法似乎与我们很像，有点像玻璃瓶回收站：其功能性和价值性一目了然，却极其无趣，乏味之极，让人顿时打消进一步深究的念头。工作勤恳，值得信赖，政治正确，斯堪的纳维亚人好比英国地方政府中的自由民主党人组成了五个国家，他们是联欢会上的精算师，是指手画脚的社会工作者，是缺乏幽默感的扫兴之人。

那么，我用什么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让大家把这本书从头看到尾呢？答案很简单。我发现，丹麦人、瑞典人、芬兰人、冰岛人乃至挪威人，特别让人着迷，我相信，一旦你发现了他们既聪明、进取，同时又非常古怪，你也会迷上他们。如果奥普拉在这里逗留的时间不止是一个下午，她一定会发现北欧人的更多优点，我也不得不勉强承认，我们可以向北欧五国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他们怎么生活，他们优先考虑什么，他们怎么处置财富；社会如何更好、更加公平地运行；人们如何在工作和事业之间求得平衡，终身学习，彼此扶助。还有那个最终的命题：怎样生活才幸福。北欧人也很风趣，当然，大多数时候不是故意为了逗乐，就我所知，这种风趣恰恰是最好的风趣。

于是我更加深入地探究北欧奇迹的秘诀。难道有一种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它规定了怎样过更好的生活？北欧的例外论（人们用例外论来

形容北欧奇迹)当中,是否存在某些因素可以传递给别的国家,还是说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它们只在该地区适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人们,如果知道了生活在地球这个角落的真实情形,还会那么羡慕丹麦人和另外几个北欧国家的国民吗?

“如果你必得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重生,而你的才能和收入属于一般水平,你会愿意做个维京人。”《经济学人》杂志在北欧主题的专刊中如此宣告,这句话貌似恭维,实则稍许带有讽刺挖苦的意味。可是,北欧实行极权统治,瑞典人古板规矩;挪威人因石油财富而腐化堕落,甚至到了不肯自己剥香蕉皮的地步;芬兰人给自己开药,吃得人事不省;丹麦人否认现实,他们负债累累,职业伦理正在消失,早已丧失原先的国际地位;冰岛人本质上是未开化的野人——这方面的讨论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只要近距离观察北欧各国及其国民,只要拨开西方媒体报道的那一层迷雾,不把他们当前所描绘的斯堪的纳维亚信以为真——星期日副刊专题报道瑞典的消夏别墅,别墅里住着金发女士,她们身穿碎花连衣裙,手挎插着紫娇花的花篮,身边环绕着头发蓬乱得颇具艺术气质的孩子们——你就会看到,真实的画面更为复杂,往往略嫌晦暗,偶尔令人费解。这幅画面包罗万象,既有生活在这几个舒适、平等、同质化的国家的一些不太要紧的弊端(换句话说,所有人挣一样多的钱,住一样的房子,穿一样的衣服,开一样的车,吃一样的饭菜,读一样的书,去一样的地方度假,对针织品和胡须持一样的观点,秉持大体类似的宗教信仰,这情形委实无聊——更多内容见后文论述瑞典的章节),也有北欧社会更为严峻的裂痕:酗酒问题,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社会平等在缓慢衰退,以及公共部门触角延伸、覆盖广泛,不得不用高水平的税收来支撑;在过去的50年里,税率在不知不觉中缓慢提升,像致命的潮水,窒息了一切希望、热情和高远的抱负,除非身在其中,否则一定

会觉得荒谬至极……

……讲到哪里了？噢，对，我决定踏上这次旅途，尽量把我的北欧经验的空白点一一填充。我启程出发，深入探索了这五个国家，分别多次重访，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新闻工作者、小说家、艺术家、政治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约谈，甚至拜访了圣诞老人和精灵卫士。

这次旅程最终让我从丹麦乡间的家园出发，一路去往挪威境内寒冷的北极水域，去往冰岛可怕的间歇泉边，去往瑞典住宅区中臭名远扬的罪恶之地；让我的足迹所及之处，从圣诞老人的洞穴到乐高乐园，从丹麦的里维埃拉到“烂香蕉”地区。

不过，在出发之前，一位丹麦外交官朋友先给我上了一课；他耐心地忍受我发了一通长篇大论，上述大部分内容均有涉及。开口说话之前，他停顿半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说，严格说来，芬兰人或者冰岛人都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指的是最早生活在维京土地上的人，只包括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但是，我在游历这一地区的旅途中发现，芬兰人保留了随意加入或者退出古老的海盗俱乐部的权利，合适的时候加入，不适合的时候退出。至于冰岛人，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我不认为他们会生气。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把所有五个国家放在一起讨论，就应该使用“北欧”这个词。但这本书是我写的，我保留任意使用“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这两个词的权利，在这本书中，这两个词基本上可以互换。

那么，我们上路吧。要想揭开北欧奇迹背后的真相，最好的切入点莫过于从聚会开始。

< 目录

引言	V
丹麦	001
冰岛	115
挪威	155
芬兰	213
瑞典	289
后记	387
献词	393



丹 麦

第1章

幸福

傍晚时分，浓重的雨云终于裂开一道缝隙，露出一抹湛蓝的天光。我们像怯生生的受到救护的动物，大胆地走出户外，站在天幕之下，呼吸着清凉潮润的空气，转而沐浴在日落前最后的温煦之中。天边泛起粉红色的霞光。夜幕降临，粉红色的霞光渐渐变成魔法般的、仲夏季节的白光。终于，墨蓝色的夜幕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宛若天象仪一般，漫天繁星闪烁其间。

仲夏节是斯堪的纳维亚日历上的一个亮点，它最早是异教徒的节日，后来被教会据为己有，并重新命名，用来纪念“Sankt Hans”（圣约翰）。在瑞典，人们头戴花冠，围着五月花柱载歌载舞；在芬兰和挪威，人们欢聚一堂，燃起篝火。我旅居丹麦，我们的仲夏节就在我朋友位于哥本哈根北部的消夏别墅的花园里庆祝，大家开怀畅饮啤酒和鸡尾酒。10点钟，我们围在篝火旁，唱起了“*Vi Elsker Vort Land*”（“吾爱吾邦”）和其他一些打动人心的民族颂歌。大家把用旧园艺用布和一把扫帚做的女巫像烧掉——我朋友8岁的女儿告诉我，这样女巫就被送到

德国的哈尔茨山去了，那里是女巫聚会的地方。

丹麦人是举办此类欢庆活动的高手。他们对社交聚会郑重以待，喜欢纵情豪饮，参加社区合唱尽心尽力，对待朋友随和友善。他们举办非常热闹的庆典，称之为 *fest*。我们这次庆典就专门安排了两名吧台招待员，布置了两台大烤架，上面炙烤着猪肉，肉块慢慢变成诱人的焦糖色，稍后还有最重要的 *nat mad*，也就是午夜小吃——香肠、奶酪、咸猪肉和面包卷——这是为了给来宾解酒，也为了让大家能够熬到第二天早上日出时分。

事情经常是这样的，我发现自己在第三杯金汤力鸡尾酒下肚之后，脑海中就开始蠢蠢欲动地冒出一些犀利的人类学洞察。我突然想到，这次仲夏节的聚会倒是一次解剖丹麦人幸福现象的绝好时机。我这位朋友的联欢会鲜明地体现了丹麦社会让我肃然起敬的许多特点，我认为，正是这些特点让他们产生了那种被大肆渲染的满足感。我站在渐渐熄灭的篝火旁边，在脑海中逐一列举这些特点。

首先是这座郁郁葱葱的花园里的氛围，花园四周用高高的山毛榉篱笆围起来，入口处规定必须插一根旗杆，一面大大的红白双色的丹麦国旗迎风招展。酒水的供应源源不断，气氛十分轻松，没有人提高嗓门，也没有人借酒生事。

其次，孩子们四处跑来跑去，嬉戏玩闹。丹麦儿童被允许自由地游荡和冒险，在英国人看来这是很老派的做法；对于丹麦人，让孩子们参加仲夏节的夜晚活动却是极其自然的，他们和成年人一样是联欢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近午夜时分，孩子们还在奔跑嬉戏，大喊大叫，玩捉迷藏的游戏，差点要撞到可乐和热狗上。

参加聚会的人们大多早早下了班，用不着“开小差”悄悄地溜出去，也用不着假装生病。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老板，自己要去参加聚会，要去海岸以北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所以必须早点下班，好作些

准备。他们的老板——如果他自己还没有为了同样的理由提前下班的话——心平气和地同意让他们早走。丹麦人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种闲散的态度令人耳目一新，我们会在后面看到，这种态度产生了重要的结果——既有积极的一面（幸福感），也有可能消极的一面（有时候，人确实需要鼓足干劲儿，全力以赴：比如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时期）。我在这个国家很少见到“活着是为了工作”的那种人；相反，许多丹麦人——特别是在公共部门上班的——对自己长期致力于尽可能缩短工作时间的态度非常坦率，毫无歉意，当然，前提是能够养家糊口和维持可接受的舒适度。丹麦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几乎只有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比欧洲其他国家短得多：欧盟的平均工时是1 749小时，丹麦人只有1 559小时（不过希腊人工作2 032小时，所以，工时并不是一个衡量生产率的硬性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30个国家的工作情况。它指出，丹麦人仅次于比利时人，是第二懒的国民——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排名。

在实际生活中，这意味着多数人下午四五点钟就下班了，几乎没有人承受不得不在周末加班的压力；到了星期五，更是过了下午一点钟，就可以把工作抛在脑后。年假经常长达6周，7月份，整个国家关门歇业，丹麦人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出行了，就像生性温顺的野羚羊，纷纷前往距离自己的住处大约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消夏别墅、房车公园或者露营地。

超过75.4万年龄介于15岁到64岁之间的丹麦人——占到了工作人口的20%以上——完全不工作，全靠优厚的失业补助或者伤残补助生活。《纽约时报》把丹麦叫作“全球最佳失业国”，它的失业津贴高达此前工资的90%，可以连续领取两年（这还是近年来进行了改革，过去可以领取11年）。丹麦人把自己的这种制度叫作*flexicurity*，这是个新造的词，它把丹麦公司可以临时通知、随意炒人而无须给予赔偿的灵

活性（与瑞典不同，在瑞典，工作仍然是终身制）与劳动力市场所享有的保障结合了起来。人们知道，即使失业，维持生计也完全没有问题。

丹麦人感到幸福，还有其他原因吗？我们还必须把消夏别墅包括在内——这是一座朴素的 L 形单层建筑，每家每户都一样，成千上万座这样的别墅散布在海岛岸边。丹麦人来到这些砖木结构的秘密据点放松心情，他们头戴太阳帽，脚穿人字拖，烤几根热狗，喝几口廉价的嘶嘶冒泡的窖藏啤酒，惬意极了。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消夏别墅，多数人也认识拥有消夏别墅的人，或者他们也许在某块露营地永久性占有一块地盘，或者在 *koloni have*（即出租花园区 [colony garden]）拥有一间小屋。出租花园好似一块认租地，但更多地强调吃着热狗，喝着价格便宜、泛着泡沫的窖藏啤酒，无所事事地晒太阳，而不是在园田菜地里挥汗如雨地干活。

这座消夏别墅如同大多数别墅一样，用小古玩和宜家的多年生植物装点。一面墙是书架，架子上摆放着被翻过多遍的平装书；必不可少的橱柜里装满了各种棋类和拼图玩具，有些图板已经遗失；当然，还有壁炉，事先已经备好了木块，以便人们在海里游泳回来暖身之用。地面是不铺地毯的木地板，这样易于清除沙子和杂草。刷得雪白的砖墙上挂着“亲戚们”创作的艺术品——家庭成员当中有人涉猎油画和水彩画，这些作品通常是些故作天真的诡异的抽象画。

我前面说过，今天晚上，酒水的供应源源不断，像约旦河一样无尽地流淌。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相比，丹麦对开怀畅饮的态度最为放任。不同于另外四个北欧国家，丹麦没有国有的酒类专卖机构。在这片嘉士伯的家乡，每家超市和街角店铺都出售酒水。瑞典人早早就成群结队地来到他们南边的这个邻国，这天晚上我就能看见厄勒海峡（Øresund strait）对岸的瑞典那明灭的灯光，他们抛开顾忌，无拘无束地体验一把他们眼中丹麦人那离经叛道、喜欢享乐的生活方式。（丹麦

的年轻人则去柏林寻欢作乐。)

夜色渐浓，我们一群人一路说笑着来到海滩上，脱掉衣服，蹣着脚走进水里。我下了很大决心才适应了裸泳，不过，裸体在这里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现在天色已经全黑了。海水淹没大腿的瞬间，我凉得一个激灵，恨不得拔腿就逃，赶快去穿衣服，但我终于还是鼓起勇气，潜入水下；全部没入水中以后，我才再次记起，丹麦夏天的海水是多么暖和，真让人意想不到。

在这样的夜晚，你很容易理解，过去的几十年，丹麦人为什么对自己的生活如此满足。只要还没到付账的时候，身为人到中年、中产阶级的丹麦人，生活必然是相当美好的。事实上，很难想象生活怎么才能更好。但是，在丹麦这个国家生活，并非一向如此称心如意。为了达到目前的这种乐天惜福的状态，丹麦人承受过可怕的伤害、侮辱和失败。后来，培根肉出现，拯救他们脱离了苦海。

第2章

培根肉

很久很久以前，丹麦人统治着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人喜欢童话，不过，这个故事却是真实发生过的。1397年缔结的卡尔马联盟是丹麦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他们的女王玛格丽特一世，其地位相当于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着挪威、瑞典和丹麦这个松散的联合体。卡尔马联盟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到1520年，时任丹麦国王的克里斯蒂安二世在所谓的斯德哥尔摩血案中，贸然处斩了80多名瑞典贵族，造成了一次外交失误。虽然丹麦设法把挪威人的联盟又延长了几百年，此后，却是瑞典在这一地区的历史中发挥了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它基本上把丹麦的脑袋按在了抽水马桶里，英国和德国则排着队去拉马桶的手柄。

文艺复兴时期，在伟大的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统治期间，丹麦有过一段短暂的回光返照——此人相当于英国的亨利八世，与亨利八世一样好大喜功，骄奢淫逸——在他治下，丹麦启动了野心勃勃的军事和建筑工程，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他在赫尔辛格（Helsingør，又称埃尔西诺

[Elsinore]) 向进出波罗的海的船只征收的通行费。赫尔辛格扼守厄勒海峡的咽喉，一度成为北方的巴拿马运河。可惜的是，在主要与瑞典的战争中，克里斯蒂安四世在战场上连连败退，终于使自己的国家沦落到破产的边缘。他的瑞典对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国王（瑞典的古斯塔夫二世）的崛起令他妒火中烧，他耗尽生机，于1648年去世。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写克里斯蒂安四世的葬礼，“财政上，丹麦已经落魄到如此地步，在她的荣耀至极的国王终于安息之际，国王的皇冠已被典当，就连盖在他棺木上的丝绸也是赊账买来的”。与之相反，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他的后半生，与日耳曼人的战争成了他孜孜以求的事业）在与日耳曼人的战斗中阵亡，他去世时，已经把瑞典发展成了北方的强国。

克里斯蒂安四世死得其时，没有活到亲眼目睹丹麦遭遇惨败的那黑暗的一天。根据10年以后，也就是1658年签订的《罗斯基勒条约》，瑞典人迫使丹麦人放弃了今日瑞典南部的斯科讷（Skåne）、布莱金厄（Blekinge）和哈兰（Halland）省，以及波罗的海上的博恩霍姆岛（Bornholm，这座岛后来被归还，至今仍属丹麦管辖）。人们很容易忘记上述区域曾经有过多么浓重的丹麦色彩，因为在现在的地图上，它们显然是瑞典的组成部分——打个比方，好似瑞典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可是，在此之前，它们一直都是丹麦领土，失去它们让哥本哈根痛彻心扉。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对丹麦人更加残酷，我恐怕不得不说，英国人也对加重丹麦人的痛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801年，一支英国舰队在副司令纳尔逊的率领下，袭击了停泊在哥本哈根城外的丹麦海军，以免它落入法国人之手。1807年，英国人为了相同的原因卷土重来，这一次把哥本哈根连续炮击了三天，造成了2 000多居民死亡，相当一部分城区毁于炮火。据说这是历史上首次对民用目标发起袭击，这

很不公平——连当年的英国媒体都同声表示谴责——而实际上，袭击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反而把丹麦人推到了法国人的怀抱。时至今日，如果你前往哥本哈根古老的大学图书馆，会看到楼梯半腰摆放着一只陈列柜，里面有一本书，在它的书页中还嵌着几枚英国炮弹的碎片。这本书的书名叫《和平守卫者》(*Defender of Peace*。我想说一句，我一直觉得，这个书名起得那么凑巧，让人感到诡异)。虽然多数英国人早已把曾经轰炸哥本哈根的历史忘得一干二净，丹麦人却还会时不时提起这个话题。“可是，那是因为你们威胁要加入拿破仑一边。”我每次都这样为历史上的英国人辩护，不过，他们好像并没有得到安抚。

写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得不违背本意，解释说明一下19世纪初的欧洲地缘政治，但我还是要抵制这种诱惑。从根本上说，当拿破仑战争尘埃落定以后，每个国家都至少一次变换过立场，丹麦发现，按照又一份可恶的条约——这一次是1814年签署的《基尔条约》，曾经由丹麦管辖的挪威，如今变成了瑞典的领地。

丹麦人该多么害怕签署条约的时刻啊。在丹麦人多灾多难的一百年间，稍后几年签署的另一份条约，最终把丹麦周边那些麻烦不断的领土剥夺殆尽，即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1864年，丹麦人又不得不放弃一千多年的防御线丹尼维尔克(the Danevirke)，把它拱手让给了普鲁士人。(同样，我很想花一点笔墨把事情的始末——道来，不过，就像巴麦尊勋爵说过的那句名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太复杂了，欧洲只有三个人知晓它的原委。一个是阿尔伯特亲王，他已经死了。第二个是一名德国教授，他发了疯。我是第三个，我把它忘得一干二净。)这里只说明一点足矣：在谈判过程中某个格外黯淡无光的时刻，丹麦国王甚至提出，可以让丹麦加入德意志邦联，这个提议遭到否决以后，他又提出放弃冰岛。但是，俾斯麦是个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

最好的人，所以，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公国都永远成了日耳曼的领土，丹麦的国界被再次重划。

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归了南边的邻国，丹麦失去了它剩余土地和人口的约三分之一，有估计认为，它因此失去了一半的潜在收入。时光荏苒，它又先后失去了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那些小块殖民地，连法罗群岛都投票要求自治。谢天谢地，幸亏冰岛还在。丹麦与冰岛还连着一根纤细的丝线：两国有一位共同的君主。但是，到了最后，连这根丝线也被那个最不可能的“解救者”扯断了，此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1940年4月，他派军队入侵丹麦，不经意间为冰岛解除了它的丹麦国家元首。

1939年，丹麦和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可是，丹麦人却在条约签订后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不派人去把守多处军事据点，这无异于公然邀请纳粹入侵。丹麦纳粹党的实力在增强，主要是由于得到了农民和地主的支持，此时，他们在议会有了自己的代表。德国人判断得没错，丹麦人不愿意发起报复，不愿意刺激希特勒发起轰炸，丹麦人在1807年已经承受过英国人的轰击了。

事实是，德国人在占领的头三年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当时的丹麦国王和首相都批评新生的丹麦地下组织，因为地下组织偶尔会发起零星的颠覆活动。与挪威人不同，挪威人在抵抗活动中体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诚然，挪威的崇山峻岭和严酷气候帮了他们很大的忙），丹麦则别无选择，只能作为温顺的德国卫星国表示臣服。有人甚至把丹麦归为德国的盟友，因为丹麦为德国提供紧缺的农产品，甚至在“二战”期间提供军队，在东线和柏林参加战斗。丘吉尔把丹麦叫作“希特勒的宠物金丝雀”。

如果说这接二连三的失败和领土丧失没有对丹麦人造成持久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还要再深入一步。我怀疑，屈辱的历史比

任何其他因素——比地理条件、比路德宗的教义或者维京人的文化遗产，甚至比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福利国家，在更大程度上造就了丹麦人的国民性格。明白了吗？正是挫败和失落，曲曲折折地造就了丹麦人。

一落千丈的境遇使丹麦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使之成了一个比其他北欧国家更具凝聚力的部落。历史学家 T. K. 德里写道（关于把挪威割让给瑞典），“丹麦国王和人民接受了这个损失……把它视为共同的不幸，它让他们团结起来，他们渴望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变化”。丢掉的领土、各种各样的打击和无数的屈辱迫使丹麦人把目光转向了内部，不仅灌注给他们一种害怕改变、害怕外部力量的意识，这种恐惧绵延至今，而且还灌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自我满足和对自己仅有的微薄之物的敝帚自珍。

丹麦再也不是曾经的欧洲强国，它收缩内敛，把大大缩小的国土范围内所剩无几的资源加以检点，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再在领土方面抱有勃勃野心。接下来就是一个可以称之为“积极收缩”的过程。丹麦人采纳了杯子半满的视角，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杯子的确是半满的，我认为，正是这种视角为他们铺平了道路，让他们建成了如今被大肆夸耀的成功社会。

当然，国民心理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在这里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把问题作了简化，但是，这种眼界缩小、自我封闭的冲动和随之而来的民族浪漫主义却是丹麦人的一个首要特点，一句丹麦人至今耳熟能详的格言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Hvad udad tabes, skal indad vindes.

（失于外者，得于内。）

这句话是作家 H. P. 豪斯特（H. P. Holst）1811 年写下的，后来，丹麦石楠协会（Danish Heath Society）选中了这句话，并以实际行动作了诠释，让它从此深入人心。该协会致力于排除日德兰半岛沙质土壤中的水分，开垦滨海土地。协会的工作如此卓有成效，到 1914 年，丹麦成功地开垦出大块新鲜的可耕地，其面积相当于此前划归德国的领土面积。

不过，豪斯特的这句名言也概括了此后丹麦文化史上伟大的“黄金时代”的真髓，那是 19 世纪中叶，社会流动性增强，艺术活动蓬勃发展，一名洗衣妇的儿子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出版了第一本童话故事集，他成了丹麦最早一批真正的国际知名人士；索伦·克尔凯郭尔写出了划时代的存在主义著作；伟大的古典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画家 C. W. 埃克斯伯格（C. W. Eckersberg）及他的学生克里森·考克（Christen Købke）、皇家芭蕾舞团的大师奥古斯特·布农维尔等，他们共同努力，使当时的丹麦兴起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的高潮。丹麦人对这些真正世界级艺术家的作品趋之若鹜，几乎把它们视为那个遭受了惨痛损失的时代全部的安慰。他们在学习做他们至今仍然最为擅长的事情：感恩并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资源；珍惜全社会的简单快乐；歌颂自己的丹麦属性；最重要的是，避免惹恼德国人。

安妮·努德森是丹麦全国性的宽幅报纸《周末报》的编辑，这份报纸也是丹麦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评论媒体。她的办公室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我与她约见时，她对照着一张时间表，向我说明 *danskhed*，即“丹麦属性”（Danishness）这个现代概念的形成过程：

1658 年，丹麦被瑞典打败。1807 年，丹麦被英国炮击。1814 年，丹麦失去挪威。不过，当时，日德兰半岛的人们还不知道西兰岛上的人们对这一切怎么看。当然，炮击影响到了中产阶级和军队，但

是主要局限在哥本哈根；失去挪威，奥尔堡的感受最深，它当年是丹麦第二大城市，非常富裕，它的贸易损失了 75%。即使这样，也还是只有极少数人对此事件有看法。丹麦国民意识的形成其实是发端于 1849 年宪法，从那时起，人们第一次可以说起“丹麦人”，这个词第一次有了连贯统一的含义。之后不久，石勒苏益格就发生了那场可怕的战争，它真正奠定了所有丹麦人同仇敌忾的基础。战败方采用了新的说法，我们这么小，这反倒更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在别的国家，建立社会民主的坚实基础是进步、工业、现代性，可是在丹麦，它的基础是 *koloni have*（那些温暖舒适的认租区）。

换句话说，在瑞典人努力推进伟大的现代而进步的社会议程之际，丹麦人却退后一步，从他们狭隘的国家浪漫主义情调中寻求逃避。狭隘至今仍是丹麦人的一个显著特点，¹ 只是他们那骤然改变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造成了一种奇特的两重性，可以恰当地描述为“谦卑的骄傲”，许多人常常误认为那是一种装模作样的矜持。

我来解释一下。假设你对他们的国家一无所知，你在结识一个丹麦人的前五分钟左右，他通常会说几句类似这样的话，“我们是个小国家。我们只有五百多万人口；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他可能还会补充说，他们这里没有高山，也没有瀑布，你开车四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丹麦全境。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从 5 分钟到一

[1]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丹麦的新闻报道。通常情况下，丹麦很少有事情发生，即便如此，新闻编辑仍然会把丹麦国内发生的平淡无奇的事件摆到最重要的位置，而不理会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有一次，我对丹麦的全国广播新闻非常气愤。在日本发生海啸和利比亚内战打响之后，它的头条报道是，部分出租房屋的租户也许不知道，他们缴纳的家庭财产保险可以帮助他们反对提高租金。于是我给那位新闻编辑打去电话，质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嗯，我们不认为利比亚有多少新鲜的内容可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年不等，视你遇到的具体丹麦人而定——你就开始察觉到，他表面上一脸歉意的谦恭背后，有着不容摧毁的骄傲。比如说，他也许会随口提到，丹麦有世界领先的风力发电产业，丹麦没有穷人，丹麦有免费的教育和医疗系统，还有优厚的福利待遇。他会告诉你，他们是全世界最可靠、最平等的人，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餐厅，对了，维京人的话题可能也会冒出来。

翻开今天的报纸，就能看到这种分裂的自我形象的典型例子。报纸的一面是一张漫画，画着几个中国商人在看世界地图。一个人说，“丹麦？丹麦在什么地方？去把我的眼镜拿给我好吗？”——意思是指，在欧盟国家中，丹麦得到的来自中国的投资最少。另一面的大标题则写道，“首相托宁可以给中国施加压力”，意思是丹麦首相即将访问北京，她将在访问期间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一两件令后者不怎么乐意听到的事。

丹麦人有一种深深的合情合理的满足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比较而言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建设成了也许是地球上最为成功的社会。这个“也许”是我加的。在丹麦人看来，没有也许。

这一成功的一大依托是丹麦在19世纪中叶发起的“中小学光荣使命”，它为丹麦奠定了基础，让它成了欧洲最早一批实行全国免费小学教育的国家。不到30年之后，又建立了民众中学（Folk High Schools），由诗人、神学家和狂热的反日耳曼人士葛隆维创办（时至今日，葛隆维仍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丹麦的首席宣传官）。丹麦近代史上其他一些关键时刻还包括，根据1849年宪法，国王放弃了专制权力，国家和平地转向民主体制，随后不久又推行了无比重要的农业合作社。当谷物价格遭到廉价的美国进口谷物的冲击一溃千里时，有了这些合作社，丹麦农民便能够在几乎一夜之间，从农作物耕种转向生猪养殖。这时候，有人发现，英国人喜欢用某种五花培根当早

餐，就想办法把猪肉生产标准化，以满足英国的这一需求，丹麦的劳动力由此找到了用武之地。

他们一发不可收拾：今天，丹麦是世界最大的生猪屠宰国，每年宰杀 280 多万头生猪。丹麦的猪肉工业占到了世界猪肉出口总额的约五分之一，占到全国农业出口的一半和全国出口总额的 5% 以上。而奇怪的地方在于，你即使踏遍这块土地的天南地北，目之所及也见不到一头猪的影子。

15 年前，我自己第一次踏足这片土地时，对丹麦一无所知。在我们深入探究丹麦成功背后的秘密之前，我要先抽出几分钟时间，告诉你当代丹麦人的某些生活侧面，我认为，你或许不知，正是这些地方使丹麦成了如此宜人的居住地。这些内容似乎没有条理，不过请你耐心地看下去，我认为它们很好地总结了丹麦生活的概况：

——丹麦第二大岛菲英岛（Funen）南部风光旖旎，它那连绵起伏的地形宛若一位侧卧的裸女。

——吃过一顿腌鲱鱼、红洋葱裸麦面包的午餐，再喝上一杯乐堡（Tuborg）啤酒和一杯冰凉的杜松子酒之后，那种微醺的感觉美妙极了。

——*Flødebolle* 是一种外面涂了一层巧克力的意式糕点，底座为威化饼干。（有点像 Tunnock 品牌的茶点饼干。有时候底座是杏仁糖，但是要避免选择这种底座的蛋糕。）

——不用操心停车位。

——丹麦国家博物馆收藏钱币的展馆的视野很不错，可以看到马路对面、丹麦议会大厦克里斯钦堡宫后面的皇家马厩。

——*overskud* 这个词的意思接近于多余的精力。比方说，“我现在不能割草，我刚吃过午饭，还喝了不少酒，这会儿没有 *overskud*”。不懂这个词，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还有一个绝妙的丹麦词语是 *smask*，指人在比如吃苹果或者早餐麦片的时候发出的惹人讨厌的声音，或者广播节目主持人说得口干舌燥时的噪音。

——我写到这里时，窗外有一只麻鸭在鸣叫，好似雾角吹响。

——有一次，我在哥本哈根街头一处相当于伦敦牛津街的地方，看到丹麦首相在选举前视察民情，周围没有一个人关注他。

——阿纳·雅各布森设计的海滩路（Stran dvej）加油站是全世界最雅致的加油站。

——电视连续剧《小丑》是斯堪的纳维亚版的《抑制热情》，只是粗俗下流得多。

——去哥本哈根以北那座古老的巴肯游乐园（Bakken）游玩，就我所知，它是瞬间把你带回到童年时光的最好去处。

——婴儿在咖啡馆外面的婴儿车里睡觉，这种现象在丹麦全国各地司空见惯，而且发生在各种天气条件下。（美国前住房部专员凯瑟

琳·奥斯汀·菲茨，曾经提出一个对各国进行排名的概念，叫作“雪糕指数”，它考察一个国家有多少比例的国民，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独自出门，走到最近的店铺买一支雪糕，再安然无恙地走路回家。根据这个指数，丹麦必然会荣登榜首或者名列前茅。)

——*Pyt* 是个感叹词，表示不要放在心上，大致可以翻译成“随它去，别想它了”。仲夏节要开办聚会，可是天公可能不作美？*Pyt med det!* (“管它呢!”)

——丹麦的电影院里有葡萄酒和啤酒出售，观众可以把酒水带入放映厅。这一点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丹麦是个多么文明的社会吗？

——演员贾斯珀·克里斯滕森(《007：大战皇家赌场》中怀特先生的扮演者)，他那张扭曲疲倦的沧桑脸孔似乎镌刻着尘世间无尽的忧伤。

——在哥本哈根运河区的克里斯钦港(Christianshavn)，蜀葵从碎石缝里生长出来。

——丹麦画家哈莫休伊的室内画，灰色调的层次非常丰富。

——乐高玩具“死星”给人无穷的乐趣。

美味的糕点、腌鲱鱼和复杂的组合玩具能够构成使人产生幸福的要素吗？也许不能(我自己的回答其实是，能)。当然，丹麦的成功、其国民那持久的堪称奥运金牌级别的幸福感背后，还有多得多的内涵。

基尼

回到消夏别墅的聚会。我朋友的仲夏联欢会最触动我的也许是，前来参加这天晚上聚会的人颇为驳杂，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各不相同，远比我在英国的类似场合可能结识的新交更为宽泛。到目前为止，我的聊天对象已经包括一名妇科医生、一名葡萄酒作家、一位议员、几名演艺人士（东道主是一名歌手）和几位老师（好像哪儿都少不了老师的身影），此外还有几位工匠和厨师，一名行李搬运工和为数众多的公共部门从业人员，其中有一名护士、一位公务员和一名博物馆管理员。那边那位，是晚间节目主持人，丹麦电视界的黄金女郎，她正在和一名屋顶工人交谈。我身后这位是一名议员，他正在与人热烈地争论，丹麦在某次手球联赛上胜出的概率有多大，与他争论的则是一个在附近地区种植草莓的人。

丹麦人好像确实有一种不寻常的天赋，能够不管一个人的年龄、阶层或者世界观，马上与之打成一片。这种兼容并蓄给我留下许多珍贵的记忆，最难忘的一次是在一个朋友的40岁生日聚会上，他那八旬高

龄的祖母被安排坐在丹麦最声名狼藉的说唱艺人旁边，两个人一晚上聊得热火朝天，十分投机。

当然，丹麦人大致是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或者像丹麦人愿意让你相信的那样，几乎是个无阶层的社会，这一点对它的包容性当然大有帮助。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丹麦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一直在为缔造这个经济平等、性别平等的社会而努力。一句丹麦名言总结得很精辟——也是一句话，类似于豪斯特的那句“失于外者，得于内”，它出自葛隆维笔下，所有丹麦人烂熟于心：

Og da har i rigdom vi drevet det vidt, når få har for meget og færre for lidt.

（我们将大步推进平等，让这里没有太多富人，穷人更少。）

这听起来好像某种乌托邦的幻梦，可是，大体来说，丹麦人成功地实现了这个梦想。历史学家托尼·霍尔在《斯堪的纳维亚：与巨怪为战》（*Scandinavia: At War with Trolls*）一书中写道，葛隆维建立民众中学的基础原则是，“只要可能，就要教导人们懂得，无论社会阶层与职业如何，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正如人只有一位母亲、一种命运和一个目标”。其结果就是，根据《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周刊，90%的（丹麦）人口几乎处于一模一样的生活水平。这种显著的经济平等不仅是丹麦人的幸福感和丹麦成功的根本，也是北欧地区整体上的成功与幸福的根本。为了搞清楚个中缘由，我们必须暂时绕道前往意大利北部，了解一下那里19世纪末的情况。

1884年，意大利科学家科拉多·基尼出生在特雷维索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基尼是个学术天才，26岁时他已经当上了卡利亚里大学的统计学专业负责人。他是个冷漠无情、工作刻苦、独断专行的人物，在事业

之初与墨索里尼结交，当上了领袖墨索里尼的中央统计学院院长。他去世时，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意大利统计学家，为人口统计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考虑到基尼的生平，他的初衷未必是为我们提供一种统计学抑或其他学科的理论——许多人认为，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具有极强的启发性，它是北欧例外论的根本所在，甚至对我们时代那个终极的世俗问题：怎么过得幸福，它也可以给予有益的指引。

这正是基尼系数，是基尼 1921 年向全世界提出的一种统计学方法，用来分析财富在一国的分配情况。基尼系数加以量化的是，一个社会要想实现财富的绝对平均分配，必须把社会总收入的多大比例进行重新分配。时至今日，这都是一种巧妙而简洁的方法，它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表现人群的不平等（虽然我被告知，严格地说，它其实不是一个系数，不过，这个问题就留给那些追根究底的书呆子去讨论吧）。

一国的基尼系数是这样测量的，在图中用一条 45 度对角线表示财富的绝对平均分配（即所有人都和别人一样富 / 穷），然后把实际的财富分配情况与这条线进行比对，考察它的偏离程度。与零值的绝对平均线相偏离的这条线，叫作“洛伦兹曲线”，它是一条简洁美丽的表示贫富的抛物线，追踪一个社会的收入或者财富的分散情况。弧线与对角线之间有一块面积，它被换算成一个系数，通常用小数表示。一国的洛伦兹曲线越接近于 45 度的绝对平等线，基尼系数就越接近于零，说明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越平等；洛伦兹曲线偏离对角线越远，基尼系数就越接近于 1，说明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

我们的北欧之旅已经启程，它引人入胜，启人思考，时而让你开怀大笑，时而又让你深深感动，如果你实在抽不开身（必然有你情有可原的理由），无法与我同行，而只能从这本书里提炼出一条有价值的信息，那么我希望是这一条：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

茨、作家弗朗西斯·福山等杰出人物，到庄严肃穆的机构如联合国等，他们所表达的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主要思想都是，基尼系数直指一切问题的要害，这个要害不仅关乎社会的平等程度，也关乎它的国民的幸福与健康。愿意的话，你可以这样认为，它是人类幸福感的要义所在。

关于用基尼系数测量社会平等的问题，流传最广、政治影响力最大的专著是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 2009 年出版的著作。在《精神层面：平等的社会发展更好》（*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一书中，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机构公布的统计数据，比较了全球 23 个富裕国家的情况——他们声称，这番比较清楚地、系统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更为平等的社会何以在一切方面、各个角度，都比不平等的社会更好。

威尔金森和皮克特连篇累牍地使用了大量图表（已成他们的标志），透彻地说明他们的论点：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几乎所有社会问题都存在直接的相关性，从肥胖、犯罪、吸毒，到精神疾病、抑郁症和心理压力。最关键的是，问题不在于贫穷和富有的绝对水平，而在于一国的最低与最高收入的差距，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以，虽然说（比如）英国与柬埔寨的贫穷标准相差甚远，英国拥有洗碗机的人数比柬埔寨要多，这却绝对不能保证英国的犯罪率比柬埔寨低，或者英国人比柬埔寨人更幸福或者更健康。正如《纽约时报》在这本书的书评中指出：

美国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也是在医疗保健上花钱最多的国家，希腊的平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一半，可是，一个出生在希腊的婴儿，它的新生儿死亡风险却比美国低，预期寿命也比美国长。